

## 关于墓志形制的几个问题\*

刘天琪

(西安工业大学 艺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32)

[摘要]墓志是古代丧葬礼俗中重要葬品,是当时人们生死观与丧葬文化的重要体现。本文重点论述墓志盖出现的时间、原则以及盥顶式墓志的文化内涵,认为盥顶式墓志的形制原形来自于祭祀的明堂,其代表“天圆地方”的构形,不仅影响着地表上关乎“礼”的器物,同时也影响着墓葬的形制与附葬明器。

[关键词]墓志盖;形制;纹饰

[中图分类号]G2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8-0014-03

墓志是古代丧葬礼俗中重要附葬品,主要置于墓中,专为记叙死者姓名、籍贯、生卒年月、生平事迹,是当时人们生死观与丧葬文化的重要体现。因墓志文多系有褒赞或哀挽的铭文,故又称为“墓志铭”。因其传承有绪,一直沿用至民国才现颓势,故为文史、金石学者所重。其所蕴涵的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书法史学、美术学、文学价值尤为宝贵,备受当代学术界关注。墓志的材质有石、砖、陶、瓦之别,南北朝以后的定型墓志以石质盥顶盒式为主,分为志石与志盖两个部分。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出土的墓志数量很多,但史料上关于其形制、尺寸、铭刻工艺等诸多方面皆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即便是《三才图绘》这样包罗万象的丛书,也没有载录与墓志相关的图式或内容。其中原因,我们推测可能为墓志虽属丧葬礼制的重要附葬品,但其主要为死去的人服务。中国人一向讳谈阴间之事,所以其神秘性一直延续,影响至今。因此,关于墓志的许多问题只能通过出土的实物资料并结合古代丧葬典制来逐步分析确定。

### 一、关于方形墓志问题

北魏平城时期的墓志均为碑形志,迁洛之后却改为带盖的方形。(图1)究其缘由,从统计材料看,元魏宗室卒葬绝大多数都为方形墓志,这种以皇族身份选择方形墓志的明显倾向,客观上对当时的墓志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引导作用。<sup>①</sup>北魏初迁之际,鲜卑贵族眷恋故土,并盼望



图1 北魏孝昌二年(526)《于仙姬墓志》(志石), 采自《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其志石外边有凹槽,把志文凸出来,在志盖上挖有与志文大小相等的凹槽,盖好后,防止志文被水浸。

死后归葬代北。有鉴于此,孝文帝曾“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sup>②</sup>又诏曰:“迁洛之人,自兹阙后,悉可归骸邛领(岭),皆不得就茔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妇今丧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

\* 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是隶属于中国城科委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的一个非营利性学术机构,致力于研究、弘扬丝路文化,提供学术交流和城市宣传平台。本文作者刘天琪为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之。其有妻故于恒、代，夫死于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宣亦从之；若异葬亦从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丧，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户属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从所择。其属诸州者，各得任意。”<sup>③</sup>从诏令看，前者纯属硬性规定，后者则采取了带有等级差异的安抚措施。《魏书·礼志》中更有大臣何休建议完善丧葬制度的记载。这些措施应当既可革除鲜卑旧俗，又可达到安定人心的目的。那么，倡兴佛事，推行诸如七七斋、水陆法会、盂兰盆会等丧葬仪式，便不失为一举多得的明智之举。文献记载，北魏胡太后之父国珍之丧即行七七斋之礼，<sup>④</sup>北魏孝明帝更有“天子举哀于东堂”之事，<sup>⑤</sup>不一而足。就墓志而言，改变原有形制，赋予其新的符合当时丧葬观念的涵义，也就顺理成章了。除此之外，朱智武先生在研究南朝墓志形制时提出“(墓志)竖状向横状的演变虽然受到‘碑’与‘帖’的影响，然而根本原因还在于志文字数多寡的限定……字数少，则占用空间小，左右宽度必然较小而趋于竖状；字数多，则占用空间大，左右宽度必然拉大而趋向横状发展”。此说虽不免牵强，但可备一说。<sup>⑥</sup>

## 二、墓志盖的出现

我们知道，墓碑、枢铭、圹记、冢记、画像题记等各种形态的志墓方法，就其目的而言，则如墓志文中所常说的：“若夫山川迴寻，舟壑徂迁，篆素有时歇灭，金石理固难朽。迺勒铭黄庐，贻诸泉壤。”<sup>⑦</sup>这既是墓志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志盖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将志主家世和生平事迹刻在石块上埋在地下，固然可以增加“式传不朽”的可能性，但其效果则因暴露在外的文字容易被侵蚀而减弱。而在志石之上加个盖子，便增加了一层防护，文字保存流传的可能性就更大。(图2)



图2 唐贞观十一年(637)《奚娘子墓志》志盖

目前所见，最早有志盖的是1992年10月出土于内蒙古乌审旗内的十六国时大夏真兴二年(420)《田明墓志》，砖质分上、下两函，上函无字，下函阴刻隶书53字，每字均涂朱砂。<sup>⑧</sup>石质墓志盖实物，始见于湖北武昌出土齐永明三年(485)《刘凯墓志》，盖上无字，志石尺寸、志文字数未详。根据以上文献、实物资料，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志盖非北魏创制。这一点已经足以澄清目前一些研究者对此的模糊认识。直接称呼墓志盖的是北魏正始二年(505)的《寇臻墓志》，志盖题铭为“幽郢二州寇使君墓志盖”。另外，早期有许多墓志的志盖缺失，“凡墓石出土，其盖往往缺失，十不存五”，<sup>⑨</sup>可能与其素面无文有关。北魏以降，典型的志石与志盖是以咬合式放置一起的。以北魏孝昌二年(526)《于仙姬墓志》为例，说明志文的四边侧雕成凹状，使志文凸在志石上边。而志盖内侧则雕成与志文面积大小相同的凹下去的形状，下葬时咬合放置于墓中。定型的盪顶式墓志，其志盖内凹也是为了避免志石和志盖直接接触，而突出的四边则起到了支撑作用。两者虽然在外观上有所不同，但在功能上异曲同工。

## 三、盪顶式志盖的文化内涵

盪顶式又称为“覆斗形”，是北朝以降墓志的主要形制。关于其源起与文化内涵，赵超先生认为，碑形志不适于墓中使用，因此在吸收了与其形制相近的陪葬器物如温明、方盒、式等器物的外形特点，尤其是“式”的外形基础，出现了盪顶式墓志，意在象征天地，又有驱邪避鬼的作用，和中国传统的宗教意识与方术密不可分。<sup>⑩</sup>刘凤君先生认为：“志石方而表示地，志盖覆斗形表示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汉至唐宋时期的大型砖(石)室墓，顶为穹窿顶或覆斗形顶，顶上绘日月星辰象征天体。方形墓室穹窿顶者，正是《曾子》所言：‘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圆，下首之谓方。始识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方形墓室覆斗形顶者和覆斗形盖、方形石墓志一样，和《天文录》‘天形如笠，中央高而四边下’的记载相符。墓志标题刻在覆斗形盖顶中间，志文刻在志石上面，亡者的功名可与天同辉，与地共存。”<sup>⑪</sup>两位先生的说法都颇有新意，也都确定了志盖与天地宇宙观念有一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马新宇先生提出：“其形制可能与当时祭祀所设方坛的文化内涵有一定的关系。方坛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媒介物，其形制本身早已积淀为一种近于概念化的象征



符号。把墓志造成缩小的象征性的方坛形状,便使之具有了移情作用带来的庄重虔诚之感。同时,又可寓尽爱之道、祭祷之心于无言之中。这大概是北朝墓志定型于此的深层原因。”<sup>⑫</sup>但对盪顶式墓志形制的源头,赵超先生的说法显然比较晚,而刘氏、马氏的说法又过于宽泛。盪顶式墓志的源头是古代祭祀用以沟通天地的明堂,墓志本身的祭祀理念亦与其相关。<sup>⑬</sup>作为“礼”的一种,明堂祭祀是古代社会礼制的核心内容之一,历来备受重视。(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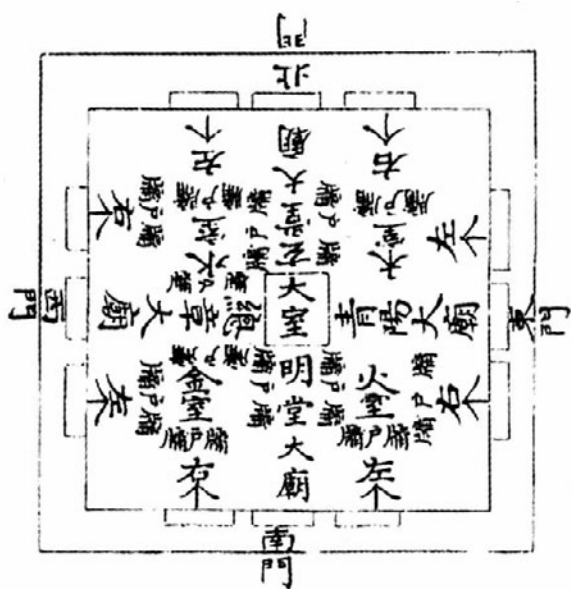


图3 周代明堂形式,采自(宋)陈祥道:《礼书》卷四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作为沟通天地的一种礼制建筑,大致不出“君权神授的象征物,权力的象征物,群体意志的象征物,社会结构、等级关系的象征物”四个范围。<sup>⑭</sup>早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已经有了天界、阳界、阴界的区别。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彩绘帛画(铭旌之一)的内容即分成三个部分,而天上境界中天门大开的胜景,则被视为最大的祥瑞,也是死者最大的福分。<sup>⑮</sup>南北朝之际,丧葬观有了进一步发展,灵魂不灭、肉体飞升、鬼神灵验、因果报应等观念成为极具普遍意义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灵魂不灭的观念更是深入人心。据《魏书·礼志》记载,北魏帝王有“冬至祭上帝于圆丘,夏至祭地于方泽”,筑方坛四陛以祭祖神的祭祀礼仪。(图4)

基于以上理论与认识,我们认为盪顶形墓志形制的原形来自于祭祀的明堂,其代表天圆地方的构形,不仅影响着地表上关乎“礼”的器物,同时也影响着墓葬的形制与祔葬明器。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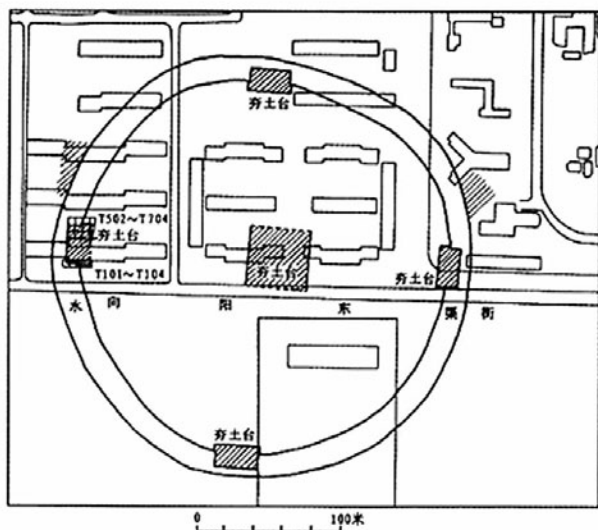


图4 北魏平城明堂遗址平面图,采自王银田、曹臣明、韩存生:《山西大同市北魏平城明堂辟雍遗址1995年的发掘》,载于《考古》2001年第3期。

也”。<sup>⑯</sup>墓志作为丧葬典制与文化重要的外在形式与道具之一,也应该从根本上体现礼的文化内涵,其特殊的形制,从观念形成到实物制作都深受影响并最终与其文化内涵相吻合,应该也是比较合理的推断。“一合”墓志,其志盖代“天”,所谓“天”者,实为“天位”,或认为是天门所在;志石表“地”,所谓“地”者,则为“地位”,乃阴界之象征。因此,定型于北朝的墓志既可隐寓哀思,又有引导死者升天之祈。

#### 四、墓志盖纹饰与题铭的意义

从北朝上层贵族墓室装饰来看,均以死后飞升为主题。<sup>⑰</sup>这些纹饰主要出现在墓门、甬道、井上栏及墓室顶等部位。墓志一般置放多在墓门前或甬道中,也有置于墓主头前者。单从墓志摆放位置来看,也应当具有与这些纹饰相近的功能。事实上,志盖上面的纹饰正与此相符,而北魏时期志盖题铭多为类鸟虫书美化装饰性书体,与纹饰相辅相成,共同反映了引导志主灵魂飞升的主题。另外,志盖题铭本身起到标志墓主身份的作用,这和秦汉时期墓葬中有很多带文字的器物(如印章)可以起到标志墓主身份的作用是一样的。从目前的墓葬考古看,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有随葬官私印章的习俗。曹锦炎先生在《古玺通论》一书中以大量古代文献与出土实物考证,认为“对春秋时玺印的普遍使用,已不用怀疑”。<sup>⑱</sup>当时人们把印章作为重要的凭信,随身携带,既用于日常的文书符契上,又可以用它证明自己的身份。死后,

就将印章系在腰带上随同下葬。所以,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官私名印,证明了墓主的身份、姓名。在汉代,墓葬中出土印章的现象更为普遍,如长沙地区西汉墓葬、广州南越王墓、徐州汉墓中,都发现了大量官、私名印。这个习惯,到晋代以后迅速式微,或许与

墓志的广泛使用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墓志盖题铭文字,刻有墓主的姓名、官爵等,也就具备了与印章一样的功用。从外形上看,墓志盖题铭的确也像一枚印拓,但墓志盖题铭是否与印章有直接关系,有待进一步论证。

#### [注 释]

- ①马立军:《试论北魏碑志关系的转化与墓志形制演变》,《史林》,2008年第2期。
-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中华书局1997年版。
- ③北齐·魏收:《魏书》,《文成五王列传·广川王略》,载“孝文帝诏”。中华书局1997年版。
- ④唐·李延寿:《北史》卷80,《胡国珍传》,中华书局2003年版。
- ⑤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 ⑥朱智武:《东晋南朝墓志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2006年,第108页。
- ⑦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 ⑧吴炜:《墓志铭起源初探》,《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
- ⑨清·叶昌炽:《语石》卷4,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⑩赵超:《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
- ⑪刘凤君:《南北朝石刻墓志形制探源》,《中原文物》,1998年第2期。
- ⑫马新宇:《试论北朝墓志题铭的文化意蕴及书体的装饰性问题》,《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 ⑬关于明堂的形制来源与祭祀等问题,可参见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
- ⑭张一兵:《明堂制度源流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⑮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
- ⑯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左传·隐公十一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
- ⑰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⑱曹锦炎:《古玺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

### 专家认为:丝绸之路学术研究需要拓宽视野

自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100多年来,世界各国大批优秀学者将毕生精力倾注于这一领域,丝绸之路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然而,近日在宁夏召开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距离形成系统、科学的丝绸之路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丝绸之路学术研究需要拓宽视野。

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越往前走,领域越宽。起初,丝绸之路的起点公认为长安(今西安),现在有学者提出洛阳也是起点之一。过去人们认为日本没有在丝绸之路上,现在考古发现,日本也有大量丝绸之路文物出土。至于丝绸之路的时间上限与下限,学界至今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正式开启了丝绸之路。但也有学者提出,

从今天已有的知识来看,东西方文化交流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存在。

丝绸之路研究是多学科、多国别的综合研究,一方面有中国境内发现的外国输入的遗物的研究,另一方面有中国古代的商品艺术品在国外的发现;正是丝绸之路双向交流的内容,需要双方合作研究,这项工作是亟待开展的重要工作。除了历史学和考古学之外,丝绸之路研究中还包含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宗教、艺术、科技和人们生活习俗方面的广泛交流内容。丝绸之路学术研究需要拓宽视野,不能只埋头考古研究,不及其余;还要关注现在,尤其是今天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现代人。